

论曾国藩对我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拓及其影响

黄细嘉

内容提要 曾国藩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家,创办留学事业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大举措。众所周知,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倡导者是容闳;但曾国藩是幼童出洋留学事业的领导者和开拓者,对我国近代留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曾国藩 留学事业 开拓 影响

作者简介 1963年生,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大量兴办,洋务官僚们逐步认识到单纯依靠雇佣洋匠来从事技术工作不利于自身对所办事业的控制。为了能够做到“自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他们萌生了派人前往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想法。他们认为“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①。于是我国近代由政府派人出洋留学的事业开始起步。这项事业是从1872到1875年,清政府以每年30人为额,共派送120名幼童赴美学习开始的。曾国藩对我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拓和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多次上奏申述,容闳的留学计划得以批准实行

曾国藩对留学事业的开拓源自于容闳的计划和自身洋务活动的需要。1854年,容闳结束了在耶鲁大学的学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人;次年,他怀着报国的赤诚,回到了祖国并暗下决心:“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②

他不懈地摸索,寻找机会实施他的派遣学生出洋留学的计划。在最初的5年他东奔西走进行游说,寻找靠山,积累资金,确定了“力识中国达官”“与上流社会交游”的行动方针,企图借助“达官”的权势去推动留学计划。1868年,容闳老友丁日昌擢任江苏巡抚,容闳趁此机会,向他“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听后,“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并要他“速具详细说帖,彼当上之文相国(指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笔者注)请其代奏”^③。后因文祥居父丧迁延时日,容闳的计划成为泡影;但容闳仍在寻找机会,“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并恳其常向曾督(指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1868年8月调任直隶总督——笔者注)言此,以免日久淡忘。”^④

1870年,容闳应召赴天津为天津教案谈判担任译员,容闳乘机游说,再次“进言于丁抚,请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⑤。其实丁日昌“于三年前已向曾督及此,故曾当已略知此中梗概”^⑥。此时丁日昌因受容闳之托,屡与曾国藩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⑦。很快,曾国藩同意了容闳的建议及留学计划。同在天津的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三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当时当地就议定立即办理,并愿意影响政府,促其

赞成”⁸⁵；而且他们决定“将四人联衔会奏，请政府觅择君所条陈而实行之”⁸⁶。果真如此，曾国藩在同意了容闳的建议后，立即将派遣留学的意图上达给清朝中央政府，以试探清政府的意见。在1871年8月18日他与李鸿章联衔会奏之前，曾国藩曾先后两次将容闳的建议“附奏在案”。在1870年10月10日的片奏中，他说：“江苏抚臣丁日昌屡与臣言：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优给资斧，宽假岁时，为三年蓄艾之计。行之既久，或有异材出乎其间，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⁸⁷后又于1871年3月2日在《钦奉谕旨复陈夷务折》中重提挑选聪颖子弟出洋留学之事。正式建议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关于曾国藩的建议对清政府产生的影响，李鸿章曾在1870年11月12日曾致函曾国藩说：“陈荔秋与容闳建议选派聪颖子弟赴西国学习，尊疏前已略陈，内无可否。其懵然不知，非不为也。”当时李鸿章已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则回任两江总督，李对留学事业亦满腔热忱，因他在京畿地区，故于朝中诸事信息更加灵通，他告诉曾国藩所提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之事之所以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是因为所奏“内无可否”，造成最高决策者“懵然不知”，并不是他们不愿意为之。他进而向曾国藩建议说：“此事先须议订条款，预筹经费。南中熟悉外情者尚多，乞令集议通筹。若有眉目，请尊处契敬衔会奏”。很显然，李鸿章请曾国藩集议通筹，待有眉目再行联衔会奏。说明在李鸿章心里早已把曾国藩看成是开拓幼童留学事业的实际领导者。其实，曾国藩知此事属创举，关系重大，必须先与清政府中枢机关通声气，再行上奏请求批准时，断不至犹如晴天霹雳，给清政府最高当权者一惊。所以，才有了几次试探性的进言。看来几次进言，清政府虽然没有表示支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说明此事清政府还是可以接受的，否则不早已引起“龙颜震怒”才怪呢。但除了让清政府最高决策者知道外，还得请总理衙门各大臣从中斡旋，必须跟他们也通声气，于是在1871年6月26日，曾国藩又同李鸿章一起致函总理衙门，建议“送幼童出洋留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以渐图自强”。说明曾、李做事都是很谨慎的，惟恐触怒某些顽固官僚终致一事无成。

待时机成熟后，曾国藩、李鸿章于1871年8月18日联衔会奏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时上奏的还有

《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就留学的人数、派遣步骤、经费、任务、管理诸问题作了详细说明。1872年2月27日，曾、李等人又会奏“请旨飭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并提出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6条。同年3月1日，最高统治者下诏由总理衙门奏议此事，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于1872年5月17日奏称：“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以彼所长，辅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充分肯定了派幼童出洋学习之请；同时就曾、李原奏中未尽未宜之事给予补充修正，主要是将所选幼童年龄由原奏所议12岁到20岁改为“自十二岁至十六岁为率”。至此，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事业开始起步。

二、多方参与筹划，留学事业进入实施阶段

曾国藩在推行留学事业过程中，除了向上奏请批准外，其实他还参与了第一批留学幼童的挑选与派遣等许多具体工作，为中国近代的留学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首先，曾国藩曾主动召集容闳，“商此事之进行”。在南京，曾、容二人为留学之事“筹议甚久”。当时“所商定者凡四事：曰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这些事项都是派遣留学的重要事情。

其次，设立管理留学事务的组织机构。为了留学事业有专责成，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下，成立了一个专门办理留学事务的组织机构，当时没有专门的名称，其负责人叫驻洋委员，后在美国正式成立“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即所谓“经理留学事务所——笔者注）”，“酌设监督二人、汉文教习二人（实为一人——笔者注）、翻译一人”；经奏派陈兰彬、容闳分为正、副监督，同时划清二人权限责任：陈兰彬“专司监视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容闳则“监视学生之各种科学，并为学生预备寄宿舍等事”；此外，确定叶源瀚为汉文教习，曾恒忠为翻译。决定所有与留学有关的事宜，“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

再次，同李鸿章函商出洋留学条款。曾国藩曾向李鸿章寄示陈兰彬、容闳等“议选幼童出洋学习条款三折”，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复信说，“遵即详

为查核,大致似甚精密”,不过对其中所派人数及经费有不同意见,又恳请曾国藩转饬陈兰彬、容闳二人,按照他所提“每年选送三十名,以三年为度九十名”的人数核算开支情况,“另拟简明章程”,并提出章程中其它应补充事项。

又次,议定在上海设立“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即预备学校)。在所奏《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中规定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这里所设之局即是预备学校性质,其职责是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地挑选聪慧幼童,“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幼童挑选后,由“沪局委员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在沪局中肄业,以六个月为率,察看可以造就,方准资送出洋,仍由沪局造册报明通商大臣转咨总理衙门查考”。对于这个沪局(预备学校)的建立曾国藩是亲与其事的,他任命熟悉洋务的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刘翰清者,久居曾国藩幕府,“刘在曾督幕府,专司奏稿,为曾督第一信任之人,故任以此职。”而且他不负曾国藩所望,“后此四批学生,预备期满,陆续派送,皆由刘君一手料量,始终其事焉”。挑选幼童出洋留学的计划之所以能按时进行,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所经营留学的预备学校,也得力于曾国藩慧眼识人。

三、开西学东来之风,幼童留美事业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曾国藩力与其事的派遣幼童出洋留学事业在第一批幼童还未出洋时,他即于1872年3月12日,卒于两江总督任上。不过,幼童出洋留学事业还是按计划进行着,8月12日第一批幼童由陈兰彬、容闳率领,自上海启程赴美,后此的3批亦按计划派出,120名幼童总算走出国门,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受到坚持闭关自守、防止以夷变夏,反对学习外国的保守势力的反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幼童留美事业至1881年时中途夭折,全部幼童在未按计划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尽数撤回。不过,尽管曾国藩等开创的留学事业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结果,但是幼童中有一些人由于刻苦努力、勤奋不懈,终成为中国重要的经世之才。在他们当中后来出现了第一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高度评价、曾主持设计修建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

路的中国工程师詹天佑;有第一位中国著名矿业工程师、为建设开滦煤矿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吴仰民;有曾任过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另外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还有梁敦彦、唐绍仪等。应该说,幼童赴美留学还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不但如此,因幼童赴美留学事业的开拓而引导的近代留学潮流却是不可阻挡的。难怪乎容闳亦说:“所幸者,首批幼童中,有二三子坚忍不拔,勤奋精进,卒成经世之才。因其呼号援引,始得使中国学生复能万里来航研讨西学。中国之强,或在兹乎!”曾国藩开创的近代留学事业“既播其种子于世,……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忽忘所自来矣”。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近代留学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它不断地冲击剥蚀着封建教育的堤坝,帮助人们挣脱科举制度的桎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日、美的热潮,容闳不无感叹地说:“是一八七零年曾文正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不啻阅二十五年而枯枝复生也”。由于曾国藩和李鸿章、丁日昌3人努力促成幼童留美事业,因而受到幼童们的普遍尊敬,“曾的肖像现挂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所的墙上,另两位的肖像也挂在那里,……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姓名应该铭记,也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人们评价幼童赴美留学事业说:这是我国首批赴美官费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开端”。19世纪末年,总理衙门在追溯我国派遣学生出洋留学的历史时说:“伏查遴选学生出洋肄业,自前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始”;同为奏请实行留学事业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尊奉曾国藩为我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拓者,认为“从前曾文正公创办‘学生出洋肄业,原所以储异日之用’”。

诚然,曾国藩采纳容闳的建议,经理了第一批留学事业,但其本意仍然只是培养推进洋务运动的科技和翻译人才;而且由于中途夭折,其成效不太显著;不过,它毕竟造就了我国最早一批为数不多的卓越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了一批略懂西学、初步涉及美国社会及其政体的知识分子,并且由于这是一次中国人主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实践,因此其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教育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刺激了其它学习西方的形式和活动的勃兴;而且极大地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为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发生重要变化。他们逐步认识到“东西文化判若天渊”,且认为对中国进行根本上的变革已是“不容稍缓之事”;正是人们在思想上的觉醒,又促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这是曾国藩等近代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始料所不及的。

可以说,曾国藩及其同僚对幼童赴美留学事业的开拓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对中国人学习西方,“实避(拟当“辟”,有可能是排误——引者)一途径”;而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实“开风气之先也”。

(责任编辑 吴直雄)

注:

① 宝璜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15,第 33页。

②③④⑤⑥⑨ 容闳《西学东渐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本,岳麓书社 1985年 7月版,第 62 123 125 125 125 126 127 126 127 128 128 145 144页。

⑦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应为初三日——笔者注)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奏》,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 153 158 155页。

⑧ 《叶依曲尔氏演讲》(1878年 4月 10日于耶鲁法学院肯特俱乐部),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本《西学东渐记》附录,岳麓书社 1985年 7月版,第 172 173页。

L 曾国藩《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曾

国藩全集·奏稿》(第十二册),岳麓书社 1991年版,第 7134页。

李鸿章《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 转引自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76页。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等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 157 157 158 158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 159~ 160页。

李鸿章《复曾相》(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

转引自钟叔河《容闳与“西学东渐”》,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本《西学东渐记》前附,岳麓书社 1985年 7月版,第 12页。

竺柏松辑,温秉忠编《最先留美同学录》前附“辑者按”,《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 3期(总第 46号),第 11页。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出洋学生肄业实录章程折》(光绪二十五年七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年版,第 174页。

李鸿章《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2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 61页;转引自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湖南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08页。